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1.010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体系演变与 区域经济增长^①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验分析

张志彬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依托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分工协作的扁平化城市体系,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群逐步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城市群首位度的降低和中心城市功能的转变,有助于提高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构建基础设施共享机制、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是提升区域经济内涵增长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城市体系;首位度;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1-0067-08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城市化率达到58.52%。我国把城市化作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要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需要协调处理好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关系,选择合理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市发展的思路是“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1989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法》中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大战略”。2000年以来,为解决移民的高度本地化和分散的城市化问题,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受到更大的关注,需要科学处理好大城市与综合承载能力、小城市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大城市和小城市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形态,恰恰

是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在城市体系内部的城市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发展。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城市群将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以此来带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等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极,众多中小城市紧凑分布其中,依托于中心城市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

动态地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都经历过从初期的“集中化”到后期的“分散化”过程,从依赖一个城市发展依赖一群城市发展的过程。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应该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与辐射功能,打造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城市群^①。城市群作为城市集中发展的一种空间形态,可实现更多外部经济,如共享基础设施、提高就业匹配成功率、分

^① 收稿日期:2018-07-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JY130)

作者简介:张志彬(1979-),男,湖南桃江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经济学研究。

^①李京文:《中国城市化进程回顾与前瞻》,《中国城市经济》2010年第9期。

享知识创造的溢出效应等。尽管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为吸引产业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但城市群总体上还是有助于形成庞大消费市场,带动城市产业和人口的增长^①。与大城市的距离是影响我国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很难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②。但在不同的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通过比较分别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发现:上海的辐射作用主要体现为“反哺”效应,北京对城市群内其他城市更多地表现为“虹吸”效应^③。

明确发展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城市发展路径对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至关重要。在工业化时代,城市多遵循着专业化路径而兴起,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钢铁之都——匹兹堡等。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等世界城市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特征,并且作为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地,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经济集聚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向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集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集聚程度越高。过去,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城市产业结构整体性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因而许多大城市通过专业化优势形成的工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必须依托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来吸引更多高附加值的工业在周围形成新的集聚。在城市群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中心城市会选择性地发展和工业融合度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并作为中心城市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载体^④。从现实情况来看,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和土地利用的跨区域再配置仍然面临着制度上的障碍,“行政区经济”导致的市场分割损害了空间集聚效应的发挥,这些都不利于区域间资源配置和经济持续增长^⑤。因此,坚持“中心—外围”的发展思路,不断提升中心城市的发展

水平和竞争力,通过消除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才能实现城市群之间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⑥。

城市群是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现实选择,也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这在理论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特别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双轮驱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使城市体系的演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耦合,才能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涵增长。中心城市在构建城市体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中心城市在不同城市群中的功能定位可能存在差异。由于城市群的异质性,不同城市体系的经济增长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中心城市如何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实现城市群内“中心—外围”的功能性分工,从而改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 理论分析和假说的提出

(一) 城市体系演变的“中心—外围”模型

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城市群体组织。1933年,克里斯塔勒最早用中心地理论来研究城市体系,发现城市体系呈现为等级性特征^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位邻近的城市会逐渐形成联系紧密的经济圈。经济圈内部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实力一般不对等,存在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增长极),并且对区域内其他城市施加影响。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存在“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影响。回流效应是指中心城市吸空外围城市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其发展会抑制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差距的扩大。扩散效应是指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对外围城市形成市场和技术外溢效应,通过促进市场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经济的共同增长。克鲁格曼发展了新

①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②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③朱虹,徐琰超,尹恒:《空吸抑或反哺: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辐射模式比较》,《世界经济》2012年第3期。

④陈红霞,贾舒雯:《中国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比较》,《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0期。

⑤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⑥于斌斌,金刚:《中国城市结构调整与模式选择的溢出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2期。

⑦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20页。

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用于分析城市空间体系的演变^①。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城市体系在地理空间上就是相近的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分布。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决定一个城市体系中空间布局的主要原因。向心力主要包括本地市场效应、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知识外溢效应等外部经济。离心力主要包括拥挤效应、运输成本、污染效应等外部。城市体系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动态演绎为“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也就是城市层级的出现^②。

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动态地解释了城市体系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城市体系则会依次经历极化再到偏平化的演变:在第Ⅰ阶段是分散经济阶段,区域中的城市和产业是分散分布的;第Ⅱ阶段是工业集聚(极化)阶段,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区域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不平衡;第Ⅲ阶段是经济集聚(极化)阶段,服务外包兴起,工业和服务业开始在功能上分异,中心城市的地位逐步强化;第Ⅳ阶段是服务业集聚和工业扩散阶段,产业在空间上分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分层流动,围绕中心城市形成功能性分工的城市群(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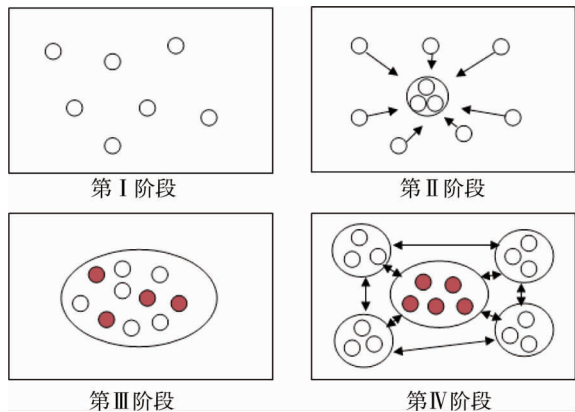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体系和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过程

(二) 城市体系演变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市体系的演变可以用中心城市的首位度来进行衡量,中心城市首位度的降低反映了城市体系

演变的扁平化趋势。城市首位度是衡量中心城市在区域中相对地位的重要指标,用首位城市人口规模与第二位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对比来表示。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构成一个城市体系,直接影响到城市体系外部经济的发挥。当要素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市时,意味着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加大对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的需求,给企业带来较高的运营成本,而且还会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那些规模过小的城市则由于市场规模小、基础条件差而难以吸引到优质资源,产业发展水平较低,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如果城市的规模分布过于平均,就会存在要素集聚度不够的问题,限制了城市内部的专业化深化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也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也就是说,随着中心城市规模扩大,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倒 U 型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的最优规模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而提升,存在动态非唯一的最优规模^③。

要素集中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获得规模经济的要素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聚的主要动因,因而扩大中心城市的规模有利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大于城市所能承载的最优规模,拥挤效应就会大于本地市场效应,要素分布趋于分散^④。尽管中心城市有相对优越的发展条件,但过多的要素集聚在中心城市,会带来生活成本上升、环境污染加剧等外部问题,既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也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较高的首位度意味着中心城市的首要要素过于集中使得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同时也意味着周边城市相对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从而限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⑤。当前,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三大增长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整体进入了工业化

① Krugman, Paul. "Confronting the Mystery of Urban Hierarch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96(4): 399-418.

② Combes P, Mayer T, Thisse J. *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曹聪丽,陈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规模与经济绩效提升——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18年第3期。

④ 周文:《我国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7期。

⑤ 闫奕荣,姚芳,黄梓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7期。

后期。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中心城市的产业率先实现转型,向后工业化时代,也就是向服务经济为主过渡。我国城市体系也出现了首位度降低的扁平化趋势,这是市场互动的结果,也是经济活动空间合理分布的表现^①。

假说1: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要素过度集中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扁平化的城市体系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绝大部分的产品创新发生在大城市。如果大城市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就会吸引更多的创新企业,集聚更多的创新资源,从而实现创新活动的累积循环效应。大城市创新活动是一个从极化到扩散过程,也是产业在大城市集聚,再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城市体系演变的过程。大城市的创新能力按照层级顺序向中小城市扩散传递。这样,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将相对减弱,中小城市则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来实现产业规模上的扩张。一般来说,越靠近大城市,与大城市的通讯网络连接越完备,吸收大城市创新成果的能力就越强。随着城市群建设的加快,基础设施的对接也成为了产业转移、创新扩散的必要条件。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直接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使中心城市的创新能扩散到空间更大的区域^②。除此之外,城市的开放程度也是中心城市发挥溢出效应的可构建重要因素。由于“行政区经济”的存在,无论是在省和省之间、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甚至是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和企业的区位自由选择都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城市的开放既包括对国外先进生产要素的开放,也包括对国内生产要素流动的开放;既包括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产业转移开放,也包括中小城市对大城市的市场开放;既包括经济领域市场的开放,也包括文化领域的开放和优惠政策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区域规模市场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汇聚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提升城市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假说2:基础设施越完善、经济开放程度越

高,越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创新的扩散效应,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外围城市经济增长。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集聚发展,不仅是因为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能获得专业化劳动的供给、更容易通过“面对面”交流沟通信息和节约交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高度密集型行业,为保证专业化劳动的可获得性与便捷性,通常在高级人才和科研院所更集中的大城市集聚发展。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集聚发展,一方面,可以更为便利地接近目标客户,增强合作者之间的信任,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获得多样化的专业供应商,获取前沿的专业信息,节约交易的搜寻成本。

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来带动外围中小城市的发展,并且中小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对接还能分享规模市场的好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还有利于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要素在城市群内部的流动,强化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协调组织功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离成为可能。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大城市,对成本因素比较敏感的制造业则聚集在大城市外围。高度集聚的生产性服务业获得了更好的产业支撑,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对大城市周围的制造业则发挥生产中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产品创新和降低制造成本。中心城市通过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周围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知识投入、智力支持以及更多的创新发展可能,实现了较低的“交易成本+创新成本+制造成本”,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竞争力。制造业向外围中小城市转移主要是因为中心城市劳动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中心城市环境规制的强化。外围城市通过参与到城市群的空间分工体系中,吸引到更多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实现了制造业的扩张与升级,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呈现下降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中心城市首位度的下降,既是要素集聚功能的

^①李松林,刘修岩:《中国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扁平化:多维区域验证与经济解释》,《世界经济》2017年第11期。

^②覃成林,杨晴晴:《高速铁路发展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经济经纬》2016年第3期。

下降,更是协调发展功能的强化。

假说 3: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有利于促进其从要素集聚功能向产业协调功能转变,在降低城市首位度的同时,提升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

大城市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投入,促进了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为生产性服务集聚发展创造条件。外围城市要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也需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外围城市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改善了企业生产运营的基础条件,能发挥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吸引产业投资,引导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入。外围城市就业的显著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需要指出的是,城市之所以能吸引大量劳动力的汇聚,一方面,城市在经济上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另一方面,城市在生活上能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好的居住环境。因此,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事业的一体化进程,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从而为城市群内部形成合理分工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假说 4:较高的科教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有利于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创新扩散,从而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推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三 计量模型构建和经验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城市体系演变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机制,提出了 4 个理论假说,接下来将利用城市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经验分析。

(一) 计量模型、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双对数模型,具体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text{模型 I: } \ln GDP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UR_{it} + \alpha_2 \ln EO_{it} + \alpha_3 \ln INF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text{模型 II: } \ln UR_{it} = \beta_0 + \beta_1 \ln PS_{it} + \beta_2 \ln SE_{it} +$$

$$\alpha_3 \ln IF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 代表城市群, t 代表时间。

在模型 I 中, GDP 是被解释变量,用城市群的人均 GDP 来衡量,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解释变量包括: UR 表示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即城市群中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比例,数值越大,表示城市群中城市发展相对集中; EO 表示经济开放度,用规模工业中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数值越大,反映了城市群的经济开放度越高; INF 表示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用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来衡量,数值越大,反映了城市群的基础设施越完善。

在模型 II 中, UR 是被解释变量,用中心城市的首位度来衡量,反映了城市体系的演变。解释变量包括: PS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来衡量,数值越大,反映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越高; SE 表示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水平,用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数值越大,反映了政府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越大,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 IFA 表示城市群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用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数值越大,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越大,企业的生产运营条件改善越大。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本文选取金融业、物流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 4 个生产性服务行业,具体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 5 个行业。截至 2016 年底,通过国家级规划的城市群有 7 个,其中较好地发挥了集聚效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主要还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因而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具体运用 2003~2016 年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 53 个城市的市辖区数据来进行分析^①。

(二) 经验分析结果

表 1 和表 2 分别给出了模型 I 和模型 II 的经

^①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邯郸、邢台、秦皇岛、沧州、衡水、承德、张家口等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盐城等城市,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等城市,安徽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等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清远、云浮、阳江、河源、汕尾等城市。

验分析结果,同时列出来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的分析结果,并进行了 Hausman 检验,以了解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得出的变量系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虚拟假设是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经验分析结果拒绝了虚拟假设,并且都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固定效应。两个经验分析中,固定效应模型的调整后的 R^2 分别为 0.929 5 和 0.935 0,说明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因而经验分析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

表 1 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α_0	4.347*** (4.44)	0.966* (4.44)
URP	-0.490*** (-4.37)	-0.580** (-4.37)
EO	0.021*** (4.74)	0.015** (4.74)
INF	0.883*** (5.62)	1.410*** (5.62)
Hausman 检验	21.70(0.000 0)	
F 值	187.37	115.08
R^2_{adj}	0.929 5	0.894 8
样本量	53	53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使用 stata 15 计量软件完成。

表 2 城市群空间体系演变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β_0	10.262*** (7.58)	3.051*** (3.81)
PS	-0.156*** (-6.77)	-0.234*** (-3.89)
SE	-2.563*** (-7.56)	-0.242* (-2.41)
IFA	-0.734*** (-5.93)	-0.654*** (-5.02)
Hausman 检验	25.71(0.000 0)	
F 值	97.65	54.13
R^2_{adj}	0.935 0	0.745 2
样本量	53	53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使用 stata 15 计量软件完成。

(1) 城市体系演变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效率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呈负相关的关系,城市体系的扁平化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首位度下降一个百分点,城市群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将提高 0.49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高,意味着中心城市汇聚了更多的生产要素,周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则趋缓。比较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只有北京的首位度呈上升趋势,广州的首位度相对稳

定,上海的首位度则呈现下降趋势。北京首位度的提高主要反映了国家的政策倾向,优质资源大量流入北京,带来北京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限制了周围城市的发展,或受到北京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小。由于政府在京津冀城市群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更大作用,加上外围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北京和外围中小城市的产业关联不强,作用更多地表现为“虹吸效应”,和外围中小城市的规模差距在持续拉大。得益于开放经济的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度和市场化的程度也更高,因而能在城市群内部形成较强的产业关联,外围中小城市获得中心城市更大的“辐射效应”,表现为中心城市和外围中小城市规模差距的缩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必然会出现扁平化的趋势,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就呈现下降的趋势,给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特别是南京、杭州和深圳等副中心城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如果剔除中心城市,2016 年京津冀城市群的 GDP 较 2003 年增长了 5.33 倍,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GDP 则同期分别增长了 5.74 和 5.43 倍,扩张速度相对更快。相较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性要更强。根据《2016 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绿皮书》:广东、江苏和浙江等三省拥有全国百强镇的数量分别为 32、27 和 20 个,三省拥有百强镇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 79%。需要说明的是,拥有强大的中心城市并不必然会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京津冀城市群中,尽管有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但河北仅拥有 2 个全国百强镇。2016 年,在 66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河北有 39 个,占全国总数的 5.86%,形成了一条“环京贫困带”。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中则没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经济开放度提高对城市群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用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其数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群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将提高 0.21 个百分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沿海开放最早的区域,为沿海城市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外资工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相对减弱。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影响系数最大的控制变量是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用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来衡量,其数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 GDP 的增长率就提高 0.88 个百分点。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基础设施一体化是最早启动和作用最明显的举措,也是最容易构建的条件。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为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缩小了城市之间的差距,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

(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中心城市首位度的降低之所以能带来区域经济更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中心城市通过溢出效应带动了周围城市的发展,使城市之间规模差距持续缩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了中心城市的产业协调功能,为中心城市首位度的降低,或者说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首位度就会降低 0.16 个百分点。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带来了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过去依赖于低成本要素发展的制造业就会向中心城市外围转移,同时吸引更多的就业向周围城市扩散,普通生产要素就会在外围城市形成新的集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对成本相对不敏感,更注重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以提供专业化服务,这就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能进一步集聚发展。通过产业和生产要素的分层流动,有助于实现了城市群的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个城市群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2016 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 4 个城市汇集了 73 家世界 500 强企业的总部,占大陆地区世界 500 强的 70%。依托总部经济的发展和高级生产要素的汇聚,中心城市成为了金融、商贸、科技等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中心城市正通过产业转型,逐步降低对制造业的依赖,实现了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城市发展的扩容提质。与此同时,苏州、佛山和东莞等中心城市的周边城市通过参与区域的专业化分工获得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机会,成为新的“制造业之都”。2016 年,东莞和佛山的制造业占珠三角城市群的比重达到了 22.40% 和 14.06%,完全超过了中心城市广州(10.19%)。这样,中心城市充分利用其竞争优势,依托创新驱动带动了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三大城市

群作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服务于中西部广大的外围区域,有利于通过专业化分工,充分发挥各等级城市的比较优势,避免陷入持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和贫困式增长的困境,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由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的速度型经济增长转向依靠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的内生性经济增长转变,从而构建基于国家价值链的城市体系,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素的流动和产业的转移是以当地教育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条件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得中心城市首位度降低 2.56 个百分点。典型的变现就是中心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科研机构在周围城市纷纷设立分支机构,迅速提高了当地的科教水平。科教水平的提高除了在改造传统产业和推动城市功能再造中发挥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向外围城市转移。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又会增加对于住房等基本生活条件的需求,因而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也有利于劳动力的有序扩散、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和固定资产更新速度的加快,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教育科研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为中心城市发挥溢出效应创造了条件,直接表现为中心城市首位度的降低和城市体系功能的重新建构。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比较分析发现,三大城市群在中心城市的主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则主要在外围城市布局;在城市群空间演变的过程中,中心城市逐步从要素集聚功能向产业协调功能转变,表现为中心城市首位度的降低和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因此,应有效提升中心城市的协调功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推动城市空间体系重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协调功能,依托城市群构建国家价值链。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要积极从要素集聚功能向产业协调功能转变。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技术溢出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和经济带动效应,利用城市群构建庞大的市场规模,在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梯度发展格局,本国大型企业集聚在中心城市主导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凭借快速成长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壮大的本土企业,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路径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这样,传统产业得到改造、城市功能得以重塑。

(2)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重构城市空间体系。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高利润、低能源消耗、低空间占用的行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空间分布优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本身的发展能带动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减少中心城市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依赖,从而推动制造业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制造业能在转移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发展水平,反过来,制造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对中心城市

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形成产业间的良性互动^①。优质的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普通生产要素向外围城市集聚,使得整个城市群都能获得要素集聚的外部性,逐步形成“中心—副中心—微中心”层次分明、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市空间体系^②。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提高了城市群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的效率,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逐步缩小,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3)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互联共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就是要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机制体制障碍,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有效率的配置。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共享是推动市场一体化过程中最重要且易构建的因素。基础设施的改善直接降低了运输成本,强化了需求的累积循环效应。依托城市群推动区域经济增长,重点就在于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灵活的开放政策等措施的稳步推进。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Urban System Evolu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ZHANG Zhi-bin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form a flatten urban system of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t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optimized resources allocation as well as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aking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through the econometric model analysis of panel data, finds tha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gradually had such “center-periphery” spatial pattern as the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ed in the central cities,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gglomerated outside of the central cities. Both the reduction of primac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s of central cities help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hus, to agglomerate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central cities, build the sharing mechanism of infrastructure, and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ed marke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endogenou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urban system; primacy; economic growth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蔡良群,李庆雪:《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动力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刘书瀚,于化龙:《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1期。